

学苑文丛

中國歷史文教學

學苑出版社

郭預衡題



曾貽芬 / 崔文印 · 著

卷之二

一、論

二、論

中国历史文献学

曾贻芬 崔文印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文献学 / 曾贻芬、崔文印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6

(学苑文丛)

ISBN 7-80060-028-9

I. 中… II. ①曾… ②崔… III. 史学-文献学-历史-中国 IV. G25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48542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高碑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7.875 印张 190 千字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是姊妹篇。《述要》重在对历史文献学发展历程的阐述,而本书则重在理论方面的探索。这两部书都是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的。尤其是白先生赞同我们提出的书籍的流传方式与历史文献学发展有直接关系的见解,并且鼓励和指导我们努力充实和完善这一见解,使这一见解最终成了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学及其历史的主线。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书所涉及的诸方面的理论,我们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上学时就听老师讲过,但要真正理解它、掌握它,还必须依赖于自己的亲自动手。我们这些浅见,既有前辈的成果,也有我们自己在整理《安禄山事迹》、《大金国志》、《靖康稗史》等书的实践中,确认和总结出来的一孔之见。我们愿与大家共商共勉,把这一学科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恩师白寿彝先生不幸于今年3月21日与世长辞,不能看到本书的出版,谨在这里表示我们对白先生的深切怀念。

著名学者郭预衡教授为本书题写了书签,这既是对我们的鼓励,又使本书得以增色,特向郭先生表示谢意。

曾贻芬 崔文印

2000年11月24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历史文献与历史文献学	(1)
一 历史文献与历史文献学的定界	(1)
二 我国历史文献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5)
三 历史文献学与史料学的区别	(15)
文献的著录	(17)
一 六分法的创始与四分法的确立	(17)
二 著名私人藏书目评析	(28)
三 古文献著录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	(38)
文献的版本	(44)
一 版本研究与我国的版刻源流	(44)
二 鉴定版本的诸要素	(46)
三 关于善本和伪本	(72)
文献的校勘	(75)
一 什么是校勘	(76)
二 历史文献为什么要进行校勘	(82)
三 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	(87)

文献的注释	(115)
一 注释的萌芽及其种类	(115)
二 注释的主要形式之一——传	(117)
三 注释的主要形式之二——章句	(120)
四 注释的主要形式之三——注	(121)
五 注释形式的发展——集解	(128)
六 说注的注——疏与正义	(133)
七 说笺	(138)
八 子注与自注	(139)
文献的辨伪	(142)
一 文献的造伪与辨伪的萌芽	(142)
二 唐宋辨伪的进一步发展	(144)
三 《四部正讹》与胡应麟的辨伪成就	(149)
四 清代辨伪说略	(160)
文献的辑佚	(165)
一 典籍散亡的原因	(165)
二 辑佚的产生与发展	(169)
三 辑佚的渊薮	(172)
四 重要的辑佚书及辑佚之失	(183)
类书、总集及丛书	(195)
一 类书的出现及其发展	(195)
二 总集的编纂	(203)
三 丛书的定界及其编刻	(210)
历史文献学的新热点及其他	(218)

一	司马迁古文今译的启示·····	(220)
二	近现代学者古文今译的比较·····	(222)
三	古文今译的误区·····	(229)
四	附说电脑排版·····	(234)
历史文献学参考书目叙录·····		(236)
一	《中国文献学概要》(郑鹤声 郑鹤春)·····	(236)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吴枫)·····	(237)
三	《中国文献学》(张舜徽)·····	(237)
四	《文献学讲义》(王欣夫)·····	(238)
五	《古典文献学》(罗孟禎)·····	(239)
六	《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 高国抗)·····	(240)
七	《中国古文献学史》(孙钦善)·····	(241)
八	《中国文献学新编》(洪湛侯)·····	(241)
九	《中国古代文献浅谈》(崔文印)·····	(242)

历史文献与历史文献学

一 历史文献与历史文献学的界定

历史文献,直白地说就是古代文献。在我国,其时间跨度大体指上自殷周“有册有典”之后,下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或稍后。在这数千年间,所有的文字载体,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文献,其中既包括甲骨文、钟鼎文、各类石刻,又包括简策、缣帛、纸写手卷及雕版印刷的各类图书,而尤其以后者为主。按照前人的解释,文献既指典籍、文章,又包括贤人在内。这说明,前人已充分认识到,在文字记录之外,还有大量的未被记录的东西,靠口碑来流传,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但人的年寿毕竟有限,我们今天来考察古代文献,正如老子对孔子所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①。”所以,元代学者马端临很实际地把古代文献分成了“叙事”与“论事”两类,他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②。

^① 《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卷六三。

^② 《自序》,《文献通考》卷首。

对于历史文献来说,马端临的说法已是比较恰当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献不仅会与后世产生语言障碍和文字隔阂,而且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还会产生散佚、文字讹误、衍脱,以及伪滥等情况,历史文献学就是通过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历史文献得以按着自己固有的面貌,或者比较接近自己固有的面貌流传下去。可以说,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

在我国,这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对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等,都已有两千来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而说它年轻,则是因为对这些丰富成果和经验进行全面化、科学化地总结,阐述其成败得失,探索其发展轨迹,却是较为晚近的事。

当然,这不是说前人就沒有作过这方面的工作,前人在这方面还是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例如北齐颜之推,就在其所著《颜氏家训》的《书证》篇中,对文献的校勘提出过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他在该书《勉学》篇中,甚至告诫后学:“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是他在校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甘苦之言。南宋郑樵著《通志》,在其二十略中有《校讎略》,对访求文献、著录文献等,从实践和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见解。清代学者章学诚,又著《校讎通义》,对郑樵的见解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看得出,前人的工作或是谈校勘,或是谈目录,大都偏重在一隅。不过他们的见解,仍不免存在某些混乱之处,如郑樵与章学诚,其所著书明明是阐述目录学,即著录文献的理论,却讳言“目录”,而称之为“校讎”。诚如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所指出:“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讎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渔

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讎,命名已误……^①”这说明前人,特别是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郑樵和章学诚,在对文献学理论探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囿于他们的某些偏见,在这方面制造了相当的混乱,而用所谓“校讎学”统贯历史文献学就是典型的一例,这种以偏概全,忽视文献学自身发展的主张,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历史文献学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个学科,至少包括下列几个重要分支,即:目录学、注释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和辑佚学;同时,它还与下列几个独立的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年代学、避讳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历史文献学的任何运作,都可看出它所属的几个分支的交互作用;同时,亦可看到,与其密切相关的几个学科的知识,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你若想了解某一书的版刻源流,你就必须首先打开目录学的宝库,依靠各类书目,你才能摸清它的基本情况;而你若想确定一下某一版本刊刻的具体年代,除了必要的版本知识,避讳学的知识你是一定要掌握的。正如著名学者陈垣先生所说:“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②”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某个时期规定的一些特殊用字,和避讳字一样,也是“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也“不啻为时代之标志”。例如唐武则天时,就规定了天、地、日、月等二十个左右特殊用字。太平天国时,也规定了若干特殊用字,如国字,太平天国时即规定中间不作“玉”而作“王”。同时规定,使用干支不用“丑”、“卯”、“亥”,而分别改成了“好”、“荣”、“开”。这都是绝好的时代印迹,是无可争辩的时代特征。因而,它们在认定版本刊刻的时间方面,具有一锤定音的价

① 《目录学发微》卷一。

② 《史讳举例序》。

值。举一个典型例证: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石塔内,发现了一卷盛于舍利瓶中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卷高6.5厘米,印以十二张黄色楮皮纸,连起来总长643厘米,卷首前十七行已残损,其余皆完整,卷尾写有经名^①。经文中的“地”、“授”、“初”、“证”等字,皆使用了武则天规定的特殊用字,这无异是其出生时带有的胎记,说明它除了是唐武周时刻本,不可能是别一时期的刻本,更不可能是中国以外的它国刻本,因为除了中国唐代武周,任何国家都无须遵循武则天的规定,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

再如,你若想对一部古籍进行校勘,你也必须首先借助目录学功夫,搞清该书的版刻情况,再利用版本学知识,鉴定各刻本的优劣,从而确定底本和校本;同时,你还必须掌握避讳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必要知识,懂得该书的公讳和私讳,熟悉古书常见的古今字、异体字及同音假借字。具备了这些知识,并能纯熟地加以运用,你才能读通、读懂这部古籍。你才能在校勘中发现问题,你才不会闹出把原书不误而当成大误的笑话来。

上述二例,旨在说明,历史文献学的确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任何运作,都必然是有关分支的交相运用和相互配合。我们今天讲历史文献学,就是强调它所包含的各个分支的彼此关系和综合运用,既承认各分支的独立为学,又在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下,把它们看作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这正是我们和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所在。古人用“校讎”统贯其它,以偏概全的作法,是死守刘向父子的校书模式,而忽略了历史文献学自身的发展。

^① 此处所叙数据皆本潘吉星《论一九六六年韩国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和地点》,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

二 我国历史文献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纵观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简策时代,纸写本时期,雕版印刷盛行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文献学,都有各自独有的特点。

我国书籍的简策时期,大约从先秦、两汉到西晋末年。这一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竹简和木牍。缣帛也是文字载体,前人甚至有“故书之竹帛^①”、“先王寄理于竹帛”的话^②,但缣帛毕竟昂贵,因而作为文字主要载体的仍然是竹简和木牍,而尤以前者更为普遍。

从已出土的实物看,通常用的竹简一般长 23 厘米左右,宽 1 厘米左右,厚 0.2 或 0.3 厘米不等。据研究,汉代的一尺,即相当于现在 23.3 厘米,这种一尺长的简牍大多用于平常记事和通信,故称书信为“尺牍”,即缘于此。

一枚竹简一般只写一行,每行二十至六十字不等,大多为二三十字。由于竹简和木牍容字量有限,以一枚二三十字为例,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就需要一百枚简牍,而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千枚简牍,实在是极为笨重,故那时的书籍只能靠单篇来流传。这种情况在古书的有关记载中看得很清楚。如《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也。

这里说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都是《管子》一

① 《墨子·明鬼篇》。

② 《韩非子·安危篇》。

书的篇名。博闻多学的太史公司马迁不说读《管子》，却说读《牧民》等，足见这些篇章在当时是单独流传的。

又如《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如果今在《韩非子》一书中的这两篇文章，在当时不是单篇流行，秦王不会把它们称作“书”，既分别称作“书”，足可说明它们在当时是单篇流行的。

再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

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

《太史公》，即《太史公书》的省称，指司马迁的《史记》。“五宗”即《五宗世家》，“外戚”即《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即《魏其武安侯列传》，都是《史记》中的篇名。堂堂大汉家皇帝向皇亲国戚赐书，不赐整部的《史记》，却仅赐其中的三篇，如果在当时这些书不是以单篇流行，一国之君是不会如此“寒酸”的。试想，一部一百三十篇的《史记》，书之简策，至少需要几万枚竹简，少说也得拉上一车，因此，它只能单篇流行，皇上赐某人以单篇，也就很正常了。

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清代学者刘宝楠，早就根据贾谊《新书》中有一篇《礼记》中的《保傅传》，指出了古代“篇传单传”的事实^①。已故当代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亦指出：“古代图书用简牍抄写，为物质条件所限制，成本高，体积大，所以多是以单篇

^① 《愈愚录》卷四。

流传^①。”这些论断已被近年考古发掘所证明,如银雀山所出汉简,除《孙子》一书外,其它如《晏子》、《尉繚子》、《六韬》等书,都不是全本,足可反映这种情况。

那么,文献单篇流传对历史文献学有什么影响呢?其影响大体有下列几个方面:

①同一作者的同一书,每个人所收藏的篇章多有不同。如管子书,据刘向说,中祕所藏为三百八十九篇,卜圭所藏的书有二十七篇,富参所藏的书为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所藏仅十一篇,而太史所藏书却有九十六篇。晏子的书也是一样,中祕藏书有十一篇,太史所藏有五篇,刘向所藏仅一篇,而长社尉参所藏却有十三篇之多。而且有的书甚至连书名也不统一。如刘向定名的《战国策》,在这之前,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六种称谓,显得极为混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著录任何一位作者或任何一个学派的著述,你都必须广泛收集在社会上流传的所有有关单篇,以便把这位作者或某个学派的著述收集齐全,这就是所谓“广收异本”。这是其它一切工作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其它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了。

②对收集来的这众多异本进行“校讎”。《文选》卷六《魏都赋》有“讎校篆籀”句,李善注引《风俗通》说:“案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太平御览》卷六一八《正谬误》引刘向《别传》说^②:“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这很有简策时代的特色,由于简策笨重,故这一工作由两个人进行。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除去重复篇章,如《管子》,就除去了四百八十四篇重复,

①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一章第二节。

② 《太平御览》作《别传》,疑是《别录》之误,不能确证,姑存疑。

定著了八十六篇。再如《晏子》，亦除去了二十二篇，凡六百三十八章重复，定著了八篇凡二百一十五章。另一个是校订文字讹误，如《战国策》“以赵为肖，以齐为立”，《晏子》“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之类^①，都是通过校讎发现并改正的。这实际上就是为某位作者或某个学派，把他们单篇流传的东西全部集中起来，编定成书，确定或统一书名，这一工作实际就是编书和校书。

③书编校完之后，才为著录创造了条件，才能进行归类和写出叙录(类似后来的提要)。

综上所述，我们已不难看出，由于文献单篇流传，著录之前，必须广搜异本，编校成新书。诚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在编目以前，先要做校讎工作，校定新本，这是图书发展的历史阶段造成的^②。”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历史文献学的突出特点就显示了出来，那就是：编书、校讎和编目三者浑然一体，彼此不能分开。必须强调，这是简策时期历史文献学独有的特点。

顺便提及，虽然在那个时代，编书、校讎、编目三位一体，但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工作称作“校讎”。对于刘向等人的工作，当时的确叫作“校某书”，如《汉书·艺文志》：“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书·刘向传》：“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再如《汉书·艺文志》称：“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都称作“校某书”，因此，我们姑且称刘向等人的工作为“校书”，是符合当时的称谓的。但这个“校”，显然与“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校”同义^③，即校理、考订之意，而非仅指“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的“校”，后一个“校”专指校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把“校书”的“校”等同于“校讎”的“校”，甚至用“校

① 分别见《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师石山房丛书》。

②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一章第三节。

③ 《国语·鲁语》。

“籀”概括刘向编书、编目的全部工作，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纸作为主要的文字载体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由于其一般造价低廉、轻便，宜于书写，容量大，很快便改变了简策时代书籍以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代之以“集”的形式流传。《四库总目》“别集类”小序说：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

其实，早在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纸作为书写工具一经出现，就显示了其极大的优越性，只是碍于世俗的观念，未能普遍采用罢了。与蔡伦同时的崔瑗，曾用纸为葛元甫抄写了一部《许子》，为此还写了封信说：“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①。”这说明，在当时，用纸抄写还颇显“寒酸”，因而还要加以解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用纸抄写的《许子》并非一篇，而是十卷，其比简策的优越性显而易见。

到了曹魏，用纸“寒酸”的观念似已有所改变，据胡冲《吴历》记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餉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②。”魏文帝曹丕虽然用缣帛抄写了《典论》等送孙权，但他还用纸写了同样的内容送张昭，这就非同寻常。前者可视为两个“帝王”间的馈送，重高贵；后者可视为两个文人间的馈送，重实用。这里显然已没有“寒酸”和“贫不及素”的感叹了。到了西晋，陆云则用纸集

① 《纸》，《北堂书钞》卷一〇四。

② 《文帝纪》裴注，《三国志》卷二。